

告别文身

□讲述：小江
整理：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张一诺

初二临近暑假时，随着学业压力增大，我厌学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不敢和父母说，因为他们只会打我。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不少社会上的“兄弟”。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每天带着我吃喝玩乐，我一度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渐渐地，为了获取更多的“活动经费”，“兄弟们”带着我在各个高档小区的地下车库盗窃。每次得手后，我都能分到一些“酬劳”。

虽然我们也常常被警察盯上，但是由于我不满14周岁，警察只对我作了行政处罚，这让我更加肆无忌惮。

2021年10月，我看“兄弟们”身上都有帅气的文身。我非常心动，也花1500元给自己的小腿文了身。万万没想到，学校发现了我身上的大面积文身，要求我先处理文身，才能回校读书。但是我一回家，爸妈看到我身上的文身，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抄起家伙就打我。

学校进不去，有家不能回。我干脆彻底把自己放逐，没钱了就跟着“兄弟们”去盗窃，偷来的钱不是泡网吧打游戏，就是去酒吧玩乐，也不接父母的电话。

直到2022年11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的丁夏维检察官找到了我，我的人生才开始转向正轨。

检察官报出了一连串的名字：刚哥、小强、胡子……我越听越是冒冷汗，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检察官怎么都会知道？检察官告诉我，我在外的不良表现他们都能掌握，因为现在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共建了一个预警平台，叫“童学好”，重点就是针对我这样的“边缘少年”。我们要是出入不适宜场所或者有偷窃、涉黄等严重不良行为，平台就会预警，民警或检察官就会来干预教育。

“不要以为你可以一直走在法律的边缘，现在只是被行政处罚，等再大一些可能就要被判刑，后悔都来不及了，青春年少做正事走正道才行。”检察官语重心长地和我说。

听到这些话，我之前的傲气全没了。我告诉检察官自己的困境，没想到，她很快与警察叔叔一起带着我找到给我文身的店铺，要求店铺退还我钱，还把我的父母叫来，一起开展教育。

看见我就要抄东西打人的爸爸，在检察官阿姨的劝解下，竟然第一次向我道歉，反省了自己的教育方式。而我，也冲破了心里最后的一道防线，放声大哭起来。

2022年12月，我第一次牵着爸爸的手，走进医院，洗掉自己小腿上的文身。下个学期，我已与老师约定好返回学校，为马上到来的中考做准备。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而性侵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根据最高检2022年6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未成年人犯罪17917人，同比上升16.61%，增幅为近四年来最低。同期，起诉猥亵儿童犯罪7767人，同比上升32.09%；起诉强制猥亵、侮辱未成年人犯罪2167人。

但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因发现难、取证难而未获处理。为有力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更好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应运而生。目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联合公安机关、妇联等建成“一站式”办案区2053个。

“建成不是终点，用好才是目的。”2022年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意见电视电话会议，对“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规范化运行提出更高要求。什么是“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谁在“一站式”办案区开展工作？效果又如何？



图①：重庆市检察院“莎姐”未成年人关爱中心。
图②：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一站式”取证场所。
图③：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七色花”未检团队对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开展心理疏导。

01 萌生

我们能为未成年被害人做些什么？

时间回到2014年7月。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在归口办理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推动区公安分局实现了此类案件专案专办，并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我们在办理案件中发现，被性侵的未成年人需要接受民警、检察官、医生、法官的多次、反复询问，极易对其心理造成‘次生伤害’，也会影响其陈述的稳定性和可信度。”奉贤区检察院“未小贤”未检团队检察官助理戴丽回忆道，“当时我们就在想，能为这些未成年被害人做些什么？”

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时，我国仅香港、台湾地区对提取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作出特殊保护规定。如香港设立“家居录影室”，室内配有摄像器材全程录影，专门配备检查室为未成年被害人验伤、取证。

“这样的场所我们能不能建？”回忆起那段时光，戴丽感慨不已，“大家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怎么合理布局、设计成什么样子、要放置哪些东西，都一头雾水，只能到处去请教，比対出最合适方案。”

经过反复研究、走访，奉贤区检察院将建设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场所这一想法汇报给上海市检察院并得到大力支持。

2015年，该院积极推动区公安分局划片选取3个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派出所建立“一站式”取证场所，要求区内所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必须到对口场所进行取证。这3个“一站式”取证场所均由询问室与心理疏导室组成，中间以单向玻璃相隔。询问室配备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全面记录取证过程并随案移送光盘。询问时，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同步参与，密切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的行为、表情及情绪，适时给予疏导、帮助。

“一站式”取证场所建成后即投入使用，同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办案模式运行实施细则》《未成年被害人适用心理疏导的实施办法》等多个规范应运而生，明确了“一站式”取证的操作流程、救助保护措施等内容，并对开展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医疗救助、经济救助等工作作出详细规定。

为达到最佳保护效果，该院制定的《关于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场所“一人一档”建档的工作规定》，将在“一站式”取证中掌握了解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背景及是否需要开展亲职教育，个性特点及是否需要

“一站式”办案区

如何从“建好”到“用好”

□本报记者 郭荣荣



02 破局

让“封闭的心”开口说话

星星之火很快便成燎原之势。几年间，江苏、云南等地陆续建立起相关场所，虽然叫法不一，但基本都是检察机关牵头，场所设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医院。

“我要报警，我女儿好像被网友性侵犯了。”2022年3月，重庆市南岸区公安机关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经初步调查发现，未成年小怀与网友王某相识于网络游戏，王某曾多次以谈恋爱为名，引诱小怀与其在酒店内发生性关系。在公安机关向小怀询问王某的相关信息时，小怀表现得十分抗拒。

公安机关立即将案情通报给南岸区检察院。该院派员提前介入侦查，并告知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一站式”办案程序。随后，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将小怀及其亲属带至南岸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点——东南医院的一间特殊诊室内，检察官也同时赶到。在医生为小怀做身体检查时，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一起列出详细的询问提纲，确定重点询问内容。

“你别害怕，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就跟姐姐聊聊你们认识的过程，好吗？”

“我们是在游戏上认识的。”
“他知道你的年龄吗？”
“姐姐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是自愿的。”

“你还不满14岁，按照法律规定，无论你是不是自愿都不可以，你现在说了，其实对他更好。”

“有一次他问过我的年龄，我就告诉他了。”
……

诊室里，刚刚结束检查的小怀显得局促不安。南岸区检察院检察六部负责人李云鹏和检察官卢敏走上前去，像朋友一般与小怀闲聊，并与心理咨询师一起向她释法说理，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她对立、紧张的情绪。

放下了心理负担的小怀在面对公安机关询问时，详细陈述了二人的相识过程、聊天内容、酒店开房时间及是否登记入住等情况。根据其陈述内容，公安机关迅速将王某抓捕归案。目前，因涉嫌强奸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将‘一站式’询问场所设在医院，能有效缓解孩子们的紧张、恐惧心理，也方便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取证和医疗。”2019年8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李延萍推动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重庆市“莎姐”未成年关爱中心（下称“关爱中心”），地址就设在重庆市中医院。李延萍介绍，建成后的关爱中心设置有询问调查区、心理疏导区、检查取证区等六大功能区域，还为存在伤情、有继续诊治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开通了检查诊治绿色通道。

记者了解到，当前，各地的“一站式”取证场所都具有询问功能，一些地区也同步具备心理疏导、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司法救助等功能。在询问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等同步参与，各地根据案情，酌情邀请心理疏导师、医生、社工及其他必要人员参与。

03 发展

推动“一站式”办案区发挥更大作用

早在2017年12月，最高检就会同联合国未成年人基金会举办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救助高级研修班”，从顶层设计方面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等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和救助工作。

2020年1月19日，最高检首次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对“一站式”办案机制作出专门部署。3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下发，要求各地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并要求2020年底各地市（州）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

2021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写入法律，成为刚性规定。

随着各地实践的深入，“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渐渐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犯罪案件办理扩展到各类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犯罪案件办理中，其场所建设、专业化工作团队、工作机制、综合救助体系及配套机制也在不断完善、深化。

重庆检察机关成立了“莎姐”导师工作室，李延萍被聘为首位导师，意在借助社会力量，发挥专业人士的引领作用，为“莎姐”检察官、志愿者“充电”。

奉贤区检察院在实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全覆盖的基础上，将未成年证人纳入适用范围，保护“半径”不断拓展。“在办理一起杀妻案中，8岁的孩子目睹了行凶过程，在对孩子这个证人进行询问时，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造成‘次生伤害’，所以同样需要通过‘一站式’场所来办理。”“未小贤”未检团队负责人黄

在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法治副校长、学校老师就作为未成年被害人小桃的陪同者参与了询问。

2022年3月，班主任发现小桃情绪波动剧烈，偶尔还埋头痛哭。班主任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后，小桃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二次强奸我”。原来，早在2020年夏天，小桃就被大伯的一个朋友猥亵了，那年她12岁。

班主任立即将小桃的情况反映给学校，并到其家中家访。交谈中，小桃的养父母坚称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要求学校不要插手此事。

2022年3月18日，宁海县检察院法治副校长在学校履职时获悉了这一线索，就要求校方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并立即将此线索移交县公安局，要求校方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经调查，小桃父亲已亡故，母亲改嫁外地，她长期由其大伯、大妈抚养。遭受侵害后，小桃出现了严重心理问题。案发后，小桃的大伯、大妈多次阻挠其前往“一站式”取证场所，检察机关随即联系当地妇联，对大伯、大妈做思想工作。而面对大伯、大妈如此态度，小桃既慌张又难堪。为了安抚小桃，缓解其紧张情绪，班主任、法治副校长陪同小桃及其家属一起，来到了“一站式”取证场所。

“到了‘一站式’取证场所，小桃的大伯、大妈还是闹个不停，严重影响了对小桃的询问。”宁海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崔雋雅表示，为了让小桃勇敢说出事情真相，该院联系了心理咨询师到场，为小桃及其家属提供专业心理服务，后小桃的大伯、大妈和大家一起去到了单向透视玻璃后。

“小桃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询问结束后，我们联系了心理治疗专家，每周跟进小桃的心理治疗和疏导，还为小桃一家申请了补贴，同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崔雋雅对记者说。

集证据、固定证据，为后续的社会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黄冰洁对记者说，奉贤区检察院的“一站式”询问、救助，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精准打击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犯罪，到取证时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综合多元救助，再到如今强调溯源治理，深挖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不断“扩容”，“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愈加明显。

……

伴随探索的深入和拓展，各地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这起侵害未成年刑事案件，为什么没在‘一站式’办案区内办理？”

“侵害未成年刑事案件办理是有什么特殊规定吗？”

少数公安民警的反问令黄冰洁倍感诧异，因为过去5年中，此类案件都是在“一站式”办案区内办理的，无一例外。很快，黄冰洁就发现问题症结：原来，公安机关人员流动性较大，很多新民警并不了解“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

李青也有同样的担忧，“辖区公安机关尚未建立专门办理未成年案件的侦查队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身体关注和保护还需加强。”

“当前，‘一站式’办案场所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如何在‘建好’的基础上更加‘用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发力方向。”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力度，主动协调教育、民政等部门采取心理干预、身体康复、复学就业、经济帮扶等多元化救助措施，助力重归快乐生活。“最高检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一站式’工作规范，推动这项机制规范化运行，把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同步开展保护和救助等工作进一步做实。”该负责人表示。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皆为化名）

